

### 《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三）

—

为了弄清“某一省”的实指，我曾调阅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和政府有关部委的全部档案及国民政府公报，可以肯定是指甘肃省的兰州市。实际情况是，1942年3月甘肃省党部分别致函中央社会部、宣传部，对兰州市政府自1941年下半年起向各剧社影院征收20%“行为取缔税”（开始称“娱乐捐附加”，为票价之一成）表示异议，称戏剧电影有益于宣传教育，内容则都经过审核批准，“本党及政府正应加以指导扶持，兹课之以行为取缔税，不啻将戏剧电影列入应行取缔之列，似有未妥”，特“请贵部及中央宣传部予以解释”。<sup>i[1]</sup>当时正值财政部拟具制定《筵席及娱乐税法》，此前曾与社会、教育诸部委会商，故社会部长谷正纲批示转咨财政部。4月24日该法公布施行，营业性戏剧电影征税30%以下。但29日中宣部长王世杰仍具签行文社会部，申明“本部认为应予免征”。5月16日，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复函社会部并请转达甘肃省党部，解释征税的根据是“限制过度奢侈消费非全系取缔性质。戏剧电影既系供娱乐则其观众自有负担能力。政府从而课以税捐，以充社会公益之用自属应当”。<sup>ii[1]</sup>我想说的是，在国民政府《筵席及娱乐税法》公布之前的不到一年时间里，兰州确实是把看话剧与吃花酒、听京戏之类活动相提并论，同类课税的。但国民党的正式法律条文中，既未见“行为取缔税”，亦找不到“不正当行为取缔税”。潘子农当时不可能了解正在立法的情况，更无法想见立法后情况的变化，并且错把兰州当成了整个甘肃，给后人以讹传讹，以偏概全留下了材料上的隐患，解放后的许多论文和教材都是这么说的。

国民党政府的第一个《筵席及娱乐税法》于1942年4月24日公布实施，第2条第2款规定娱乐税征稽对象为“以营业为目的之电影、戏剧、书房、球

房、及其它娱乐场所”，税率“不得超过原价百分之三十”，但一切音乐演奏会及不以营利为目的之娱乐免征。娱乐税属间接税，规定由顾客承担，专用发票，经营者代征，违例惩罚。<sup>iii</sup><sup>[iii]</sup>该法规后于1943年7月、46年12月、47年12月三次修订重颁，基本内容未变，但税率（上限）调幅较大：1942年4月——43年7月间为30%，1943年7月——46年12月间为50%，1946年12月以后为25%。<sup>iv</sup><sup>[iv]</sup>其中，1945年1月——46年12月间降为40%，但未见正式立法，属于临时调整。据葛一虹、张颖、周特生、刘川、金玲（陈白尘夫人，当时与中艺住在一起）等人的回忆，这些捐税每场都由当局派员在演毕后立马结清带走，不准拖欠，更谈不到偷漏。<sup>v</sup><sup>[v]</sup>

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法规，1942——49年期间，话剧演出总体赋税情况如表1：

税 种	税 率	备 注
营 业 税	3%	直接税
印 花 税	10%	直接税
节 储 金	约 10%	根据行政院立法于票外代征，实际有储无还，等于苛捐
娱 乐 税	25——50%	间接税
所 得 税		直接税。因所有剧团最终都无所得，故该项名存实亡

[材料来源：《国民政府法规汇编》第十四至二十一集所载有关营业、印花、所得、娱乐各税法，以及节储金征管条例中与话剧演出有关的条文]

表 1

赋税额在48——73%之间。如果再加上随票附征的各项经常性杂捐20——30%，演剧捐税总额则达到68——103%之高，这在中国历史上都称得上空前绝后。<sup>vi</sup><sup>[vi]</sup>特别是在抗战后期的1943年7月——46年12月期间，连续3年半保持在103%以上，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这还是陪都重庆的情况，外地常常高于这个比率。无怪乎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都认为，这实际上是“寓禁于征”了。上海收复后，情况稍显特殊。1946年初市政当局宣布，从2月1日起，娱乐税增至60%，引起各界的强烈抗议，纷纷撰文或举行座谈，猛烈抨击当局的反动政策，到5月份，市政当局不得不将税率降至20%。

除了高赋税以外，更加不近情理的还有低票价，这是国民党战时物价限制政策的一部分，强制实行，也必须遵守。具体情况是：(不含间接捐税)

时 段	国统区最高价	备 注
1939、3 以 前	1 元，不限价	同期上海孤岛 0.4——0.6 元，不限价
1940、3 以 前	5 元，不限价	同期上海孤岛 1——5 元，不限价
1940、3 以 后	10 元，不限价	国统区经济进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
1942、4 以 前	15 元以下，限价	同期上海沦陷区 0.5——6 元，大致与电影持平，不限价
1942、4 以 后	30 元以下，限价	同期上海 0.5——6 元，不限价
1943、9 以 后	50 元以下，限价	国统区剧人生活全面恶化。同期上海票价上限涨到 50 元，限价
1944、5 以 后	65 元以下，限价	上海话剧广告全部取消票价内容
1945、1 以 后	100 元以下，限价	国统区娱乐税临时降为 40%。上海话剧广告锐减，战后几乎全部被电影所取代。

[材料来源：《新华日报》、《大公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中央日报》，以及《申报》1938——49 年间的话剧广告]

表 2

而战前天津的票价是 0.2——0.5 元（1937 年 1 月天津《大公报》），上海是 0.4——1 元（1937 年 1 月上海《申报》），相比之下，涨幅最高达 200 倍以上。但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物价上涨指数，批发价为 2359 倍，零售价为 2619 倍。<sup>vii</sup><sup>[vii]</sup>二者相差 2000 多倍。这种荒谬绝伦的高捐税低票价政策对话剧艺术的杀伤力是可想而知的。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剧人陆续复员回上海，但上海物价却是一天一个样，根本无法组织演出，所以只好纷纷转向电影业，或者去台湾旅行公演，最终于 1948 年初全部解散。

## 下篇：国民党的话剧政策对话剧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损伤

演剧职业化是话剧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夏衍说，话剧的“现代化，换言之，就是我们要彻底扬弃旧时代的陈旧办法体制，而完成一个可以适应于今天和明天的剧团组织和演出制度的问题”，<sup>viii</sup><sup>[viii]</sup>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职业

化的演剧体制”。ix[ix]近百年来中国话剧荣辱兴败的历史一再证明，没有艺术生存机制的现代化，精神审美（创作）和舞台艺术的现代化，便很容易蜕化变质，或被偷换。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市民社会欠发达的后发展国家而言，艺术生存机制的现代化特别需要政治国家的合理调控与有效保护。本来，任何艺术都包含着教化与娱乐的双重品性，因为历史境遇不同，侧重点各异，所以形成各种各样的艺术风貌，这是很正常的。一般来说，二者应处于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张力关系中，如果过分向一端倾斜就会消解另一端的制衡作用，而双方的过分背离或势不两立同样会撕裂这种制衡关系，所以国家的艺术政策和法规应该合理地调节这种张力，使之谐调健康地发展。但国民党的话剧政策建立在教化与娱乐，国家意志与市民社会的严重背离之上。抗战后期，国家权力无限膨胀，严重侵蚀公共空间，话剧的生存天地愈形狭窄，条件不断恶化。1943年以后，在政权和市场的夹击中，“职业化的演剧体制”濒临破灭，话剧的思想艺术水准普遍下滑，国民党话剧政策两歧性的恶果，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了。

---

i[i] 社会部档案，11——1000。

ii[ii] 社会部档案，11——1000。

iii[iii] 《筵席及娱乐税法》，《国民政府法规汇编》第十四集，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印，1942年版。

iv[iv] 参见国民政府文官处铸印局编印《国民政府法规汇编》第十五（1943年版）、十八（1946年版）、十九（1947年版）各集所收《筵席及娱乐税法》。

v[v] 本文作者采访记录：2000年9月23日在南京采访金玲，2000年9月29日在南京采访刘川，2000年10月22日在南京采访周特生，2000年12月12日在北京采访张颖，2000年12月12日在北京采访葛一虹。

vi[vi] 参见徐乘骊(陈白尘)《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危机》，《戏剧月报》第一卷第五期，1944年4月；记者：《剧人昨天纪念戏剧节 希望解除一切困难——马彦祥历述戏剧界艰苦奋斗的情形》，1944年2月16日《新华日报》。

---

vii[vii] 参见彭明、张同新《民国史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7 页；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9 页；盛灼三《民元以来上海之物价指数》及其附录，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 1948 年 1 月初版第 407——410 页；杨寿标《中国财政统计大纲》，中华书局 1946 年版第 44——45 页；《中华民国实录》第五卷·下·六（商业与物价），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等。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物价指数，各家虽因统计指标不尽一致而略有出入，但大同小异。一般认为零售价上涨 2300 倍左右。

viii[viii] 夏衍：《人·演员·剧团》，《天下文章》第二卷第一期，1944 年 1 月。

ix[ix] 夏衍：《论正规化》，《戏剧时代》创刊号，1943 年 11 月。

厦门大学图书馆